

总序

摇摇“海国图志”丛书属于生者，为生命及其动力服务。它既属于行动的人和强有力的人，也属于受难的人和需要解放的人。不过在一个特别的意义上，它严格地属于行动的人和强有力的人，正是这些人在进行一些大的事业和斗争，他们尤其需要模范、指导以及至关重要的安慰。

“海国图志”丛书的根本信念乃是对波利比乌斯的追随，正是波利比乌斯把政治历史恰如其分地称为统治一个国家的正当准备，称为最优秀的教师，这教师通过唤醒人类沉重的记忆来警戒当代，让当代学会承受福祸的交替。因此，“幸福”将遭到本丛书的抛弃；“荣誉”将重新夺回历史庙堂中无尚尊荣的惟一继承权。在本丛书中，“荣誉”将不再是叔本华或者边沁眼中的“我们自私自利的最美味的食物”，而将成为对所有时代中伟大事物的共同和恒久的信仰，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真正构成了对于无常灾难和世事交替的抗议。

歌德曾经谈论说：“当时代处于衰亡期，一切倾向都是主观的；当事物正在成熟以等待新时代时，一切倾向都是客观的。”“海国图志”丛书坚决认为，在一切生者的世界中，并不存在这种歌德式的戈尔迪之结，挥刀之间即可斩断，因此，有关“人类事务中渗透着一条辉煌原则”的辉格党式的朦胧信念将被彻底拒绝，无论是格雷欣法则、亚当·斯密的市场法则、伯克的商业法则，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拉萨尔的工资铁律，都概莫能外地被视为“虚假的假说”。另一方面，“海国图志”丛书也拒不接受“克丽奥帕特拉的鼻子”理论，我们尊重“偶然性”的可怕权能，但不会将之奉为人类事务的至高主宰，正如吉本评论：“希腊人，当他们的国家沦落为一个行省之后，不是把罗马胜利的原因归结为共和国的德性，而是归结为共和国的好运。”——这是失败者历来的观点和态度，就如同二战之后那些仍然值得敬佩的德国人总是把过

去四十年的民族灾难归因于皇帝的浮夸、高龄的兴登堡恰巧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的总统,以及希特勒的个人性格那样。

卡莱尔曾将路易十五称为“一个极端世界性的混乱化身”。他说：“这是一个多么崭新、多么普遍、多么变化迅速的运动啊！制度、社会秩序、人心，难道这些曾经合作的事物，现在以令人心烦意乱的冲突形式在翻滚着、摩擦着吗？必定是这样。这是一个终于衰竭的世界性的混乱的毁灭。”“海国图志”丛书同样拒绝卡莱尔的上述观念，因为在政治历史中，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时代，道德从来都是一个无从决断和没有答案的难题，更确切地说，道德根本不是一个问題，否则，我们将无从解释雅典的衰落和马其顿的崛起，无从解释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和罗马君主制的崛起，同样，我们在赞叹吉本的才华之余，却不得不反对他就罗马帝国的衰亡所作的普遍道德论的文化史解释，因为这一解释并未起到教化后世大英帝国的实际作用。

“海国图志”丛书意在尊重人类事务的本质，而不是盲从于那些不能产生实际效用的抽象理论；失败往往源自对最能产生实际效用的措施、原则和思想的抵制，转而去赞同那些宣称具有普遍效用的、系统的方法或原则。思想家们都试图把一个国家之伟大的特征告诉读者，并用它们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然而，他们忽视了不可能有人预知未来，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及时认识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复杂性；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为国家的富强或者衰败作出自己的贡献，但谁能宣称了解一个国家？

进一步来说，人类事务的客观性并不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在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变化的那种标准；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对亚里士多德的反对。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诗歌比历史“更严肃”、“更富有哲理”之类的话，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歌关乎普遍真理，而历史则只关注特殊与个别的事物。我们之所以反对亚里士多德，这是因为我们遵从霍布斯的更合情理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名字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普遍的，因为有名字的事物

中的每个东西都是独特的、个别的。”这也正是“海国图志”丛书的根本信念所在。

必须强调的是：“海国图志”丛书的血脉虽取自先人魏源，但就其性格和目的而言，我们并不自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召唤。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皆以此自勉。是为序。

“海国图志”丛书编委会

公元二〇〇七年十月

序

摇摇伟大的思想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这就是它们为后来的解释提供了多样的可能性,为原创性的思想提供了激发灵感的观点。霍布斯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伟大的思想还有另外一个鲜明的特征,这就是它们提出了某种划时代的判断和理论,从而宣告某种新的体系的诞生,确认某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霍布斯的思想也是这样一种思想。

在哲学领域,研究这样的思想体系乃是学术活动的主要内容,而在相关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也属于重要而基本的工作。对于学术领域的新进来说,这样的研究除了基本训练的意义之外,也是运用学术综合素质的必要的实践。

对这类思想体系的研究,通常有两种类型。其一就是所谓专业性的研究,它以文本为基础,着重于文本分析、思想阐述和解释,其中最为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康德研究之中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先验演绎结构的分析解释。而在霍布斯这里,吸引专业研究关注的问题虽然并不像康德的例子那么经典,却也有其颇为丰富的内容,从对利维坦概念本身的诠释,到义务、公民与共同体问题,而至于整部《利维坦》的结构,和霍布斯思想的历史渊源与英国普通法的发展等。另一种类型就是所谓营造的研究,此种研究的宗旨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研究对象的文本和思想被视为构建自己体系的基础和平台,而分析和解释乃是通向自己思想的途径。在霍布斯研究里面,麦克弗森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入此类,他通过重新诠释霍布斯的理论来为自己的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做论证。

在中国学术传统中,这两种方法分别被称为“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不过,两者之间的界线并不是截然分明的,一种深入的专业研究总是要以某种思想和观点为纲,而营造的研究也必须以扎实的文本

知识以及相关的背景知识为基础。不仅如此,即便专业的研究也始终要以新的见解为基本的目标,而不论这种新的观点是就一个或若干术语、一个或若干命题、一种或若干观点的新的考证和解释,还是对整个体系或结构的新的解释和梳理,否则学术研究就会失去意义。因此,虽然大多数的研究属于前一种类型,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它们实在也可以说是居于两者之间的。营造的研究因为旨在创新,所以通常是一种更为艰苦、风险更大的工作,虽殚精竭虑也并不一定达成,所以成就者也只在少数。

王利的霍布斯研究如其所言,冀求某种对“建成强大、正义和持久的国家”的“普遍有效的教诲”(参见本书第源页),因此就其目的来说,已经超出专业研究的领域,而试图营造某种自己的东西。高远的志向必须立足于坚实的基础,而在这里就是对《利维坦》的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对霍布斯思想体系的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对相关研究材料的必要的了解,以及对霍布斯思想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的领会。就后者而论,王利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就拟定了一个计划,要逐个地研究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的理论,从而达到把握其发展大势和具体内容的目的。对一名中国学者来说,这确实也是一个宏大的目标,因为迄今为止尚无人在深入研究各位思想家原始著作的基础之上完成过如此宏大的工作。对一位决定以学术为业的青年学者来说,这样的志向是值得嘉许的,当然也不免要补充一句:要坚持到底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在研究了斯宾诺莎之后,王利把霍布斯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专心致志,深入其中。此刻要来考察上述志向的意义,衡量的根据主要就在于其研究本身所花费的功夫。

王利博士研究工作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就是其对文本的深入研究。他第一次提交提纲时,还附有对《利维坦》全书所做的逐章的分析报告,这体现了他在钻研文本上面所下的苦功——自然这一功夫也是颇有成效的,除此而外,他对霍布斯的其他著作也下了不小的功夫。如此这般的文本研究不仅令他熟悉霍布斯著作的细节,更要紧的是使

他能够进入对霍布斯思想的全面而中肯理解的境域,从而做论证时可以自如地引证原文,这样自然也就为提出一些在专业研究层面独到而有根据的见解奠定了基础。

还值得一提的是,王利对霍布斯研究文献,从同时代人的评论到不同流派、不同类型的研究著作,所做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可以说是国内鲜有的全面和仔细。全面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以汉语和其他语言撰写的研究文献——实际上,主要是英语、德语或法语的文献——是达到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而非灰色学术成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视野自然就会开阔,而所提出的独到的见解自然也就是真正独特性的东西,而不是一隅之见——而人们所常见的那种将自说自话自认为新见的东西,是无法放到台面上来经受实际的批评的。

王利在本书中提出两个简明而基本的判断,即在政治上,利维坦是绝对的,在道德上,利维坦是正义的。就前者而论,作者努力以此来为霍布斯通过利维坦所设计的国家提出一种支持性的论证;而就后者而论,作者尝试将自然权利视为利维坦的道德原色。与此直接相关,作者为本书提出的任务也就是分析和阐述利维坦的结构即国家的政治构成及其道德基础,同时又以政治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来为上述两个判断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霍布斯思想固有的矛盾解围。

王利以此来谋篇布局,以重新构造《利维坦》论证结构的方式和路数对霍布斯的思想进行重新解释。这一重构和解释对《利维坦》本身来说,可以说是说有意义的和富有启发性的,这也是体现这部作品原创性的要点。除了一般的自然权利、自然状态、自由等等概念,本书还突出了《利维坦》的其他一些概念的重要性及其它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比如理性、激情、恐惧、人造的(或人为的)。上述的努力,使霍布斯的思想具有了一种运动的节奏,而整部作品的进展也显得自然而流畅。

霍布斯乃是近代政治学、政治哲学和一般社会理论的奠基者。其

学说对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学一直发挥着重要而现实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思想乃是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必读文献和基础知识,同时也是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进而言之,不熟悉霍布斯,自然就无法有效地从事现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也无法有效地从事关于现代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史的研究。

但是,霍布斯思想的这种重要性究竟落实在哪些观点和理论上面,在学界是大有歧见的,唯有一个判断是人们大体能够取得共识的,即霍布斯从哲学上以及一般社会理论层面上宣布并且系统地论证了如下一个命题:政治共同体及其社会制度是由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这样的观点既非霍布斯的首创,亦未在他那里达到顶点。那么霍布斯的重要性在哪里?人们为自己建立社会制度的可能性、条件和关键之点又是什么?如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应当具有何种性质?在这些问题上,霍布斯与其同时代人、其后来者有着显然不同的见解,而研究者不仅对这些区别有不同的见解,就是对霍布斯本人的观点也有不同的理解。这一切以及其他不能毕举的因素,正是霍布斯思想具有吸引力的渊藪之一方。

政治哲学之所以属于哲学,其中原因之一正是它可以通过分析、推理的手段从一些基本的观点来构成原理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此来分析和批判现实的制度。但是,这些基本观点乃至观点的构成元素的起源却并非单单通过政治哲学而能够获得答案的。并且对像霍布斯这样的大思想家的研究,始终也不可能限于单一学科的范围,因而也不可能是单单政治哲学的研究。政治哲学之所以是政治的,因为它乃是一门实践的学科,所以必然要证之于人的现实活动,即历史的或社会的实际行为。于是,从一个更为广大的历史视野来考察,可以一般地说,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乃是英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长期变迁的结果,同时也直接受到当时社会各种势力之间斗争的影响。但是,从这样一种变迁的历史与现象之中观察到并且总结出一种新的社会构成方式,这是需要独特而深刻的眼光的,而把它系统地表达出来,更需要强大的

思想力量。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的理论有其多重的独特性。在研究霍布斯思想时,从单纯的原理分析和结构研究起身,出于其外来环视一下它的历史和社会境域,对理解那些基本元素和原理,是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的,而在研究的目的又包含“普遍有效的教诲”这种现实的指向时,那样的参考就更是必不可少的了。

思想的力量最为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这就是批判和构造。分析在本来的意义上与批判是同义的,不仅在几种主要的西方语言中是如此,在汉语里也是同样如此。无论析与判,在通常的情况下是要用刀的,于是,思想的力量就要像干将莫邪一样锋利,然而又要直指要害,切中肯綮。人们在研究一位思想家时,会喜爱其思想而至于为其辩护,这是学术研究中常见的现象。这个现象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被研究者的思想有令人感兴趣、为人所赞成、佩服和同情的内容,才会令人兴起研究的念头、产生探索的动力,甚至觉得有回护的必要。大概出于这样的原因,王利对霍布斯的思想吝于动刀,这固然无伤于霍布斯的体系,却也使作者的思想力量无法充分地实现出来。当然,我也有充分的理由说,思想的锋芒是要在学术争论中磨砺,然后才脱颖而出的。

王利的著作是汉语霍布斯研究的一个优秀的成果,它也是王利学术生涯中坚实的第一步。毫无疑问,与此同时,我期望王利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迈出更为出彩的第二步、第三步。

韩水法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写定于北京魏公村听风阁

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目录

《利维坦》献辞

导言 员

- 一、政治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 员
- 二、政治与道德 源
- 三、本书的论题、思路和结构 怨
- 四、《利维坦》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 员
- 五、简述研究霍布斯的几个重要传统 员
- 六、简述霍布斯的中文研究状况 员

第一章 摇主权的的目的 员

- 一、自然状态 员
- 二、共同的善 员
- 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推论 员

第二章 摇主权的构成 员

- 一、统治者主权与人民主权 员
- 二、主权的产生：契约论 员
- 三、信约与授权 员
- 四、同意 员

第三章 摇绝对主权者 员

- 一、主权与主权者 员

- 二、主权者的权利 缘
- 三、绝对性 缘
- 四、对绝对性的初步反思和推论 迹

第四章 臣民的自由 苑

- 一、服从的逻辑 苑
- 二、义务与自由 苑
- 三、臣民与主权者的一致和冲突 愿
- 四、小结：什么是绝对主义 愿

第五章 保卫利维坦 员

- 一、国家制度 员
- 二、利维坦的三次出场 员
- 三、公民宗教 员
- 四、教育 员

第六章 何谓正义？ 员

- 一、不义与正义 员
- 二、罚、赏、教 兼论保卫利维坦 员
- 三、社会德性 员
- 四、正义的意志 员
- 五、小结 员

第七章 道德基础 员

- 一、激情与理性 员
- 二、伦理学 或激情的道德倾向性 员
- 三、自然权利 员

结语 181

一、综述 :为什么是利维坦? 181

二、问题 182

三、结论 :利维坦是一个乌托邦 183

附录一 《利维坦》的篇章结构 187

附录二 《利维坦》第九章末尾的知识分类表 188

附录三 《利维坦》中自然法的内容与结构 189

附录四 《利维坦》重要术语表 190

参考文献 193

后记 194

《利维坦》献辞

致我最尊贵的朋友摇戈多尔芬的弗朗西斯·戈多尔芬先生

尊贵的先生：

令兄西德尼·戈多尔芬先生乃海内人杰，他在世之时，即对我的研究赞赏有加，并如您所知，以其真知灼见惠泽于我。这些高见本已殊为精妙，加之令兄的尊贵身份，更显卓尔不凡。任何能使人敬奉上帝、效忠国家、公民社会及私人友爱的德性，皆在其言谈中表露无遗。这并非是情势所需，亦非应景之作，而是出自一种光彩夺目的天性和雅量。故而，现将我有关国家的论述呈献给您，以表达我对令兄的尊敬和感激，以及对您本人的忠诚。我不知世人将如何看待它，也不知它将如何影响可能赞同它的人。在一条熙熙攘攘的路上，众人互相争斗，一方要求过度的自由，另一方则要求过度的权威。欲求两不相伤而安然通过，殊不可得。然依我所见，提高国家权力的努力，不应受国家权力的谴责，也不应受叫嚣此权力过大的私人的非难。而且，我所谈的还并非是人，而是抽象意义上的权位（犹如罗马主神殿里的守护者，他们朴实无华、不偏不倚，以其言说守卫其中的神灵，此乃由他们身在其位而定，而与他们是谁无关）。窃以为，我所冒犯的只是不在位的人，对于那些身居权位的人，却是在帮他们的忙。最有可能冒犯的是《圣经》的某些文本，我引用这些文本实属另有目的，与他人的常规用法有所区别。但我以适当的谦恭引用《圣经》，这实为我的论述主题所必需。因为这些文本是敌人的外围工事，他们正是由此向国家权力发难。尽管如此，即便您发现我的作品遭到普遍诋毁，您还是会乐于亲自为我辩解，说我是钟爱自己观念之人，并认为我所言句句属实——我尊敬令兄，也尊敬您，我期待您像我一样，无需了解就会欣然接纳本书的标题。

先生，您最谦卑、最顺从的仆人

托马斯·霍布斯

巴黎 1651年 源月 16日

导言

一、政治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

人类世界是否存在完美的政治生活,如果存在,如何将这种生活付诸实施,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探寻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的争执: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认为,政治生活要追求高尚和卓越的目标,实现至善和终极目的,在人间建立完美社会;现实主义认为,实现理想政治的机会太小,理想主义者过高地估计了人性,对政治的血腥和残酷认识不够,所以只能依靠实力夺取政权,胜者王侯败者寇。

在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脉络上,政治理想主义的代表在古代有柏拉图,设想通过哲学王实现政治和哲学的统一,认为由理性和智慧统治才能建立正义的城邦;^[1]在近代有莫尔的《乌托邦》和培根的《新大西

[1] 参见 Plato, *Republic*, trans. by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四次提到柏拉图。在第二部分的结尾,他在将自己的学说与柏拉图对比后评论道:“考虑到这一切之后,我几乎认为自己费这一番力就像柏拉图搞出他那共和国一样没有用处了。因为他也认为在主权者由哲人担任以前,国家的骚乱和内战所造成的政权递嬗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100;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by Richard Tuck,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00。以下引用《利维坦》时采用中英文对引的形式,简化为“《利维坦》第三十一章,页100”。

岛》。^[10]政治现实主义在古代的代表是政治史家修昔底德,他不动声色地讲述了斯巴达由于恐惧雅典帝国主义势头的扩张而引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11]在近代的代表则是马基雅维里,他在对古代作家的模仿中将政治和道德截然分开,给后人留下了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

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冲突的焦点在于对政治目标和手段之间关系的认识上。理想主义认为政治目标一定是高于政治生活现实、同时也高于人们个人利益之上的公共的善,一般倾向于在政治领域之外寻找政治目标,比如道德上的至善、终极幸福,哲学上的理性和智慧,或者神学上的至福。这些目标不但能实现政治生活本身对秩序的要求,更能引导和控制赖以实现目标的手段。现实主义往往贬低、忽略甚至否定理想主义为政治设定的目标,他们通常认为,政治是自足的领域,政治必须在追求自主性中解除道德、哲学、神学的束缚,使政治权力成为其自身的尺度。于是,先前达成政治理想的各种要素和手段不再担负那些共善,它们逐渐成为不受控制也不可控制的中立性力量,现实主义的最后结果就是将手段当成目的。

从人类社会的实践来看,现代政治一方面充满了解放、革命、世界大战、冷战、军备竞赛的现实斗争和战争恐怖,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全球化、地

[10] 霍布斯曾于1629—1630年之间被暂调去任培根的秘书(Amanuensis)。1630年霍布斯与人合作、匿名发表在《荏苒闲暇》(Horae Subsecivae)中的三篇论文《论塔西陀的开端》、《论罗马》、《论法律》据说是模仿培根《散文集》的模仿。参见 Thomas Hobbes, *Three Discourses: A Critical Modern Edition of Newly Identified Work of the Young Hobbes*, ed. and intro. by Noel B. Reynolds & Arlene W. Saxonhous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尤其参见编者长篇导言“霍布斯与荏苒闲暇”。施特劳斯提供了霍布斯在实质方面受到培根影响的论证,参见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1996, 尤见第六章、第八章。

[11] 修昔底德对霍布斯的影响需要另文专门阐述,但毫无疑问,修昔底德的影响至深。霍布斯署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翻译(参见 *Hobbes's Thucydides*,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Schlatter,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9, 尤其见霍布斯为译作所写的导言和“修昔底德其人”)。他称修昔底德为“有史以来最具政治意义的编史作者”(《英文全集》第八卷,页 viii)。虽然在《利维坦》一书中霍布斯并未直接提到修昔底德,但从他对希腊典章制度和风俗人情、尤其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实信手拈来的使用,足可见他对修昔底德的熟悉程度。

球村、知识经济、一体化等世界大同的倾向,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差异还是认同,人们依然在自愿和被迫间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但在这一过程中,内至人们的内在良知和精神世界,外至太空宇宙与浩茫星空,无一不可作为人们征服和控制的对象;^[1]亲密如父母兄弟、友爱如夫妻爱人、敬重如父兄师长,无一不可成为人们竞争和取胜的工具。^[2]

相应于现实,现代政治理论家们在批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和基督教传统的基础上,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指导,成功缔造了符合科学原则的政治原理,实现了以现实主义为体、以理想主义为用的结合。一方面,将现实秩序从超越秩序、将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确认了人的秩序和人造世界的合法性;^[3]另一方面,在没有神的年代,各种假先知和人民领袖纷纷借神圣之名,妄称“绝对”。^[4]前者的结果是中立性政治^[5]和技术统治^[6],进

[1] 这涉及“政治空间”的概念,可比较阿伦特和施密特“空间”概念的异同,另参见 Hans Blumenberg, *The Genesis of the Copernican Worl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页 222; 以及洪涛:《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页 222。

[2] 参见反极权主义的文学作品,典型的如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辽宁教育出版社,页 222;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页 222。

[3] 对现代性的概括和表述可参考韦伯的“脱魅”(Disenchantment)及理性化命题,参见《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页 222; 洛维特的世俗化命题,参见《世俗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页 222; 布鲁门伯格以自我证成(Self-Assertion)对现代之合法性的概括,参见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页 222。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命题其实可以追溯到霍布斯,他的论题就是人造秩序的合法性。

[4] 参见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对假先知和群众领袖的批判。同时参见汉娜·阿伦特对绝对性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Absolute)作为现代革命的思想史本质的批判,参见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页 222; *On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页 222; 以及萧高彦:“立法家、政治空间与民族文化——卢梭的政治创造论”《政治科学论丛》,1993年,远月,第 1 期,页 222。尤其参见页 222。同时参见莱妮·丽芬斯塔为二战时期的德国拍摄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

[5] 参见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页 222。尤其参见“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一文,页 222。

[6] 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页 222。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他的朋友和学生在这一主题下展开的现代性批判需要重视。如雅斯贝尔斯对现代精神气质的思考、施特劳斯在批判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基础上重新掀起的古今之争和重新发现苏格拉底、洛维特对世俗化命题的研究、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和近代革命的反思、马尔库塞对“单面人”和工具理性的批判等等。